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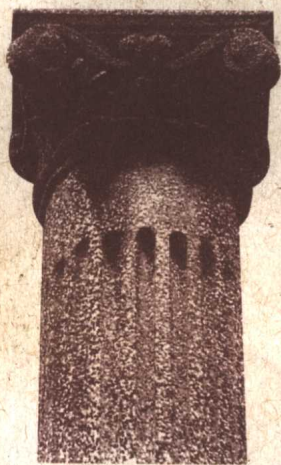


许纪霖

人文精神的多元意义 批评规则的缺席 / 知识分子的意义世界 / 1995年的中国批评界 / 批评界的市场意识 / 王蒙、张承志现象的断想 / 从精英语语到市民话语 / 崇高与优美 / 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 / 利奥塔与中国的后现代 / 后现代在中国的发生学背景 / 文坛怪事 又一景 后现代在中国的意蕴

在信仰的废墟上 / 赋予荒谬以意义 / 批评的界限

狂出真性情 抗战与知识分子 / 民族决战岂止在战场 / 曾国藩与儒家的三不朽 / 狂与中国文化 / 胡适这一代人 / 陈寅恪的精神遗产 / 丁文江与好政府主义 / 人格魅力的意义 / 一个科学家的从政错位 / 吴晗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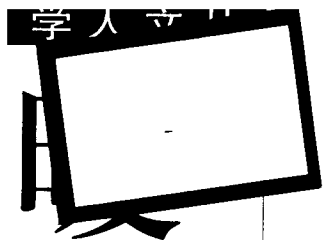


怀旧 暖味的

女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兽权与人权 / 走向第二次性别大战 / 搞关系与知名分 / 外语：文化还是工具 / 书摊里的文化“小传统” / 休闲，现代人的文化苦旅 / 《故事会》的文化下乡 / “学术垃圾”如何清扫 / 辩论赛可以降温矣

奥斯卡堕落了 / 孤独让她如此美丽

原生态的多元意义空间 / 不无失落的《太阳有耳》 / 假做真时真亦假 / 类型化的把戏 / 话语的力量 / 终极关怀失落之后 / 还历史以大手笔



味 的 怀 旧

▶ 许纪霖

学人文丛

暧昧的怀旧

许纪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81,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5,150本

ISBN 7-5320-5563-9/G·5805 定价:(软精)9.90元

目
录

第 1 辑

- 人文精神的多元意义 ③
- ⑦ 日常生活的意义
- 知识分子的意义世界 ⑨
- ⑬ 1995 年的中国批评界
- 批评规则的缺席 ⑬
- ⑰ 批评界的市场意识
- 王蒙、张承志现象的断想 ⑲
- ⑳ 从精英话语到市民话语
- 崇高与优美 ㉒
- ㉔ 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
- 利奥塔与中国的后现代 ㉖
- ㉘ 后现代在中国的发生学背景
- 后现代在中国的意蕴 ㉚
- ㉜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第 2 辑

- 抗战与知识分子 55
- 58 民族决战岂止在战场
- 曾国藩与儒家的三不朽 62
- 65 狂与中国文化
- 狂出真性情 70
- 74 胡适这一代人
- 丁文江与好政府主义 79
- 84 人格魅力的意义
- 一个科学家的从政错位 87
- 91 陈寅恪的精神遗产
- 吴晗的悲剧 93
- 96 过早夭折的思想天才

第 3 辑

- 终极关怀失落之后 103
- 106 还历史以大手笔
- 思想界的托翁 108
- 110 史学中的《十日谈》
-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困顿 112
- 115 中国研究的“创世纪”
- 鸦片战争的悲剧性 118
- 121 “公车上书”百年回眸
- 将轻松还给读者 124

- 123 王朝衰落的证言
 作为信史的散文 131
 心态史的魅力 134
 真实的生命存在 138
 141 显微镜下的“日本虫”

第 4 辑

- 在信仰的废墟上 145
 149 赋予荒谬以意义
 真正的精神圣徒是谦卑的 152
 157 体验中的抵抗
 孤独让她如此美丽 160
 164 好一个徐坤
 笑傲江湖一“杀手” 166
 169 婚姻是爱情的滑铁卢
 无奈中的美丽神话 173
 177 艰难的狼羊之辨
 文坛怪事又一景 180
 182 不诚实的狗尾续貂
 批评的界限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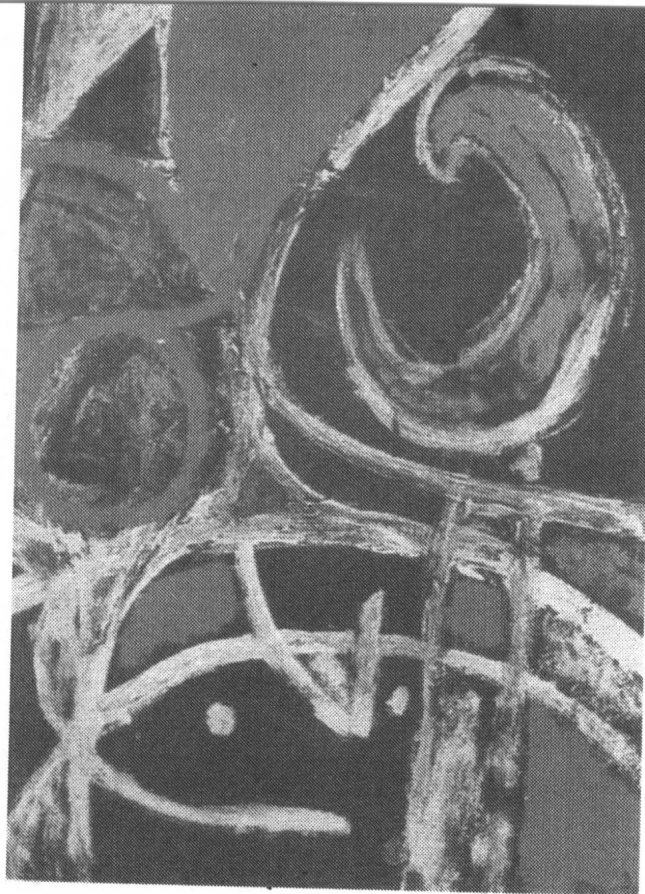
第 5 辑

- 191 暧昧的怀旧
 原生态的多元意义空间 194
 198 不无失落的《太阳有耳》

- 历史片中的“故事新编” 201
- 假作真时真亦假 204
- 奥斯卡堕落了 207
- 类型化的把戏 209
- 话语的力量 211
- 家族干预何其多 214
- “上海闲话”与电视剧 217

第 6 辑

- 兽权与人权 223
- 女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25
- 走向第二次性别大战? 230
- 搞关系与知名分 233
- 外语：文化还是工具? 235
- 书摊里的文化“小传统” 240
- 休闲，现代人的文化苦旅 243
- 《故事会》的文化下乡 245
- “学术垃圾”如何清扫 247
- 辩论赛可以降温矣 250
- 比成功更重要的 252
- 何处寻觅文学梦 256
- 259 编后



第 **1** 辑



人文精神的多元意义

1993年岁末,上海的一批青年学者在酝酿以人文精神为题展开一系列讨论时,万万没有料到,不久以后它竟会成为文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之一。就像过去的科学、民主、自由等一样,一旦人文精神的谈论成为时尚,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语义多歧、误解纷起和莫衷一是的局面。于是,人们最关心的仍然是: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

然而,在一个本质主义已经遭到普遍质疑的知识时代,这一问题可能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我们无法在一个抽象的、思辨的层面上确定人文精神的标准含义,因为一个词的意义总是能动的,与具体的语境相关的。置身于不同的语境,就具有不同的意义。当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呼吁人文精神时,它的意义在于对人的正常欲望的肯定和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追求;当我们说顾准“在地狱中的思考”充满人文精神时,指的是那种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抗议和反思精神。当上海的青年学者们讨论人文精神时,其语境和意义又有了很大的变化,90年代中国出现的世俗化、技术化和功利化的单边发展,使得人的精神关怀和价值追求受到了普遍的忽视,而人文精神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批判和超越。

我们可以回答人文精神不是什么,比如不是专制,不是匱

乏,不是物欲的泛滥,不是技术统治一切,但我们无法确切地说人文精神必定是什么,当我们一定要说它是什么的时候也就限制了它开放的、多元的意义,它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就是一只大麻袋,什么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它毕竟还有自己公共的“意义群”,它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的意义体现着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的性质;这一性质很难以确切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可以比较不同语境下的意义经验地体会出来。

人文精神涉及到人之成为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律令。这一律令正像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一样,是一种非经验性、非实质性的形式化规定,它回答的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可能性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话语范式,它又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人文精神作为“概念形式化的工具”,提供了主观建构的可能性,是经验事物的形式条件。要使其成为必然出现的事物,还必须填充进现实的、历史的、经验的内容。我们无法直接确定人文精神的抽象意义,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置身于一定的话语体系,赋予其明确的实质性内涵,它的意义才会呈现出来。

人文精神只是一种规范性的指向,至于这一原则在历史中如何理解、如何落实,可以是多元的、开放的,能够通过理性争辩的。人文精神不应该为某家某派所独占和垄断。某种经验性的现实或话语是否符合人文精神,不应该由谁来裁决,而只能通过不同价值体系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共识。人文精神不仅内部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对外是开放的。它并非仲裁历史或现实的终极标准或元话语,它只是众多合理性标准中的一种,它拒斥以己为尺度完全否定历史进步的标准或物质生产的效率原则,但也同样反对后者以一种元话语的面目出现

贬低人文精神的规范化意义。

人文精神由于其所具有的精神乌托邦性质,实际属于一种否定的、反思的话语,而非肯定的、建构的话语。它类似于罗蒂所说的“启迪哲学”,永远留在正常话语的外围。它并不为时代提供正面的建设性蓝图或体系化的清晰话语,它只是以自己的独特角度审视着世界,以超越的立场实现对社会的批判。人文精神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的乌托邦层面,在于不断地以自己深刻的思考和尖锐的声音提醒世俗社会的人们,在追求工具合理性的同时,必须回头检视目的的合理性和行动的意义问题。不过,人文精神也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限度。如果有谁以目的合理为藉口超越界限,从话语批判走向社会建构,从个人信仰走向群体实践,设计以实现人文理想为目标的社会改造整体工程,或者推行道德教化、精神清洁的运动,人文精神就会失去其正面的意义,显现出悲剧性的负面。海德格尔和顾城分别是西方和中国两个再好也不过的极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很丰富的人文精神,但是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越过了合理性界限,反而违背了人文精神的原本的规范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精神的确需要警惕那种为神圣名义所驱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旗帜的、群体化的社会实践冲动。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在属性上应该是归属于知识分子的。罗蒂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特殊而奇异的需求,希求不可名状,希求崇高,希求超越限制,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社会制度”。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不同,他们所依据的不是现实世界中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超越于各种具体利益之上的精神乌托邦立场。这种立场是独立于系统世界中的权力与

货币运作之外的,而与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对于“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语)的抗拒,除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构建之外,还要有一个精神的支点和本源的立场,这,就是人文精神。如果说人文精神之于当代中国,就像以往的革命、解放、民主、自由等等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神圣词汇的话,那么蒙受这种神圣性恩泽的不是别人,正是批判型知识分子自身。人文精神,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与货币的操纵,实现批判性思考的合法性渊源所在。

1995年夏

日常生活的意义

90年代中国的最大变化,莫过于社会的世俗化。投射在文学作品上,就是话语类型的变化,从一种崇高的话语转变为一种日常的话语。超凡的、可歌可泣式的英雄史诗悄然隐去,代之以对日常生活和凡夫俗子不动声色的客观描述。各种旗帜的小说,无论是上海的“新市民”,南京的“新状态”,还是北京的“新体验”,无不具有类似的意味。

面对日常生活的复苏,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们最关心的往往是这样的问题:日常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在1995岁末的《上海文学》上,我读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日常生活的命运》,作者是沪上新近崛起的青年评论家薛毅。他认为,日常生活的意义既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也非理想主义所能外在附加的,它的意义应该在日常生活之中去寻求,不是用意义去控制日常生活,而是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

是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必须内在地去寻求。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张爱玲所描写的都市生活,琐碎得不能再琐碎,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但一经她的生花妙笔,立即变得趣味盎然,俗中见雅。这就是日常生活自身的意义,一种充满人性的超越意义。

日常生活的意义,自然不可能只有一种向度,比如张爱玲

那种优美的趣味。它也可以在生活中发掘崇高,发现荒诞,甚至感受到生活的无意义。无论何种意义,都将体现为一种深度,对日常生活本身观照的深度,而不是像当代中国所谓“后现代文学”那样,呈现给你的只是一个生活的表象,一个粗俗的生活平面。那些作家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很苍白,再加以平面化的展现,又如何不显得平庸?

日常生活的命运一向多舛,政治意识形态左右它,激进的理想主义拒斥它,后现代主义则将之平面化。而对坚守人文精神的文化人来说,所应做的似乎是赋予日常生活以其自身的意义。意义的寻求将使日常生活不再俗不可耐,不再充满物欲,而是具有一种精神的投射,一种温和的超越,一种趣味的升华。

日常生活自然是最具物质性的,是充满物欲的。但日常生活并不意味着精神的绝对匮乏。那种世俗与理想、物欲与精神的二分法无疑具有思维简单化的特征。只要对物欲性的日常生活以精神的阐释和人性的提升,就有可能区别于平庸。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能力。而对人性理解的深度,正取决于我们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感受。

1996年春

知识分子的意义世界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高速起飞,使得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遥远图景,而成为活生生的部分现实。现代化,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希望,但它真出现在面前时,人们又会发现现代化并非如想象的那般美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世俗化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秩序的失范,终极关怀的失落和人文精神的淡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所能作的,也许只是凭藉自己的超越性思考和敏锐感受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仅仅如此而已。我们不可能直接改变现实,只能通过我们的话语,构建公共话语,影响人们的思维,间接地参与社会进程。事实上,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直接面临的已不仅仅是外在于自我的社会问题,而是自身的生存方式的困境。

9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是一个迥然不同于80年代的生活境遇。政治意识形态退潮了,但另外一种更为普遍化和商业化的商业意识形态却以前所未有的凶猛势头迅速崛起,它对知识分子的生存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如果说在80年代,知识分子无论命运沉浮,总还是居于舞台中心的话,那么到90年代却真正地被边缘化了,完完全全成为商业社会尴尬的多余人。文化热中形成的精英意识骤然成为一厢情愿的自

恋幻影。在新的时势之中，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究竟何在？这大概是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后知识圈中议论最多的问题。

我认为，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知识分子可以扮演两种角色。一种是学者，那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注定寂寞的位置。如果你选择了这一角色，就不得不忍受这种寂寞，甚至有可能是物质生活的贫乏。但在隔离的智慧中，上帝会赐予你求知的幸福，那是其他任何物欲的满足都无法替代的快乐，是真正的智者才配享有的欢愉。另外一种角色是观察者，那是站在知识 / 文化的立场上，对社会发生的种种现象作出独立的观察和评论，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和参与到当代社会的文化进程之中。这两种选择无高下之分，依据个人的性情和爱好。可以是单向性的，也可以一身兼二任。而我，所选择的就是后者：一方面以一种超然的学术姿态继续研究现代性 / 后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纯粹是个人知识上和文化上的兴趣，至少在主观上不希求对社会发生什么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以一种介入的文化方式关注当代中国的现象、热点，通过大众传媒发出自己良知的声音。知识分子通过对生活世界具体现象的创造性阐释，体现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和批判，从而以话语构造另一个超越了世俗社会的意义世界。

美国哲学家罗蒂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特殊而奇异的需求，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任何人的语言游戏，不受制于社会制度。”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化评论，都是知识分子实现职业价值和自我尊严的人生途径。近些年来，社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充满了各种诱惑人的机遇和选择，以前学术圈的一些朋友也顺应时代大潮，下海经商或去从事文化传播事业。我们尽管为他们的学术才华惋